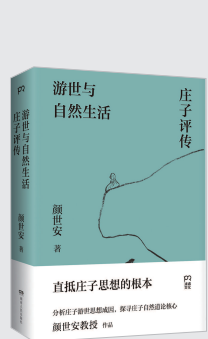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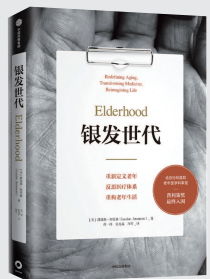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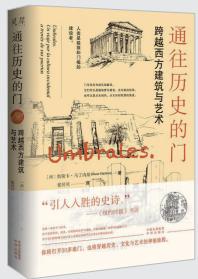
作者深入浅出剖析了庄子的人生态度与生存哲学,解读庄子游世之言背后的孤傲与认真,直抵庄子思想根本,直面人生困惑:面对“黑色偶然之命”,应该如何生活?

《游世与自然生活: 庄子评传》
顾世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2年10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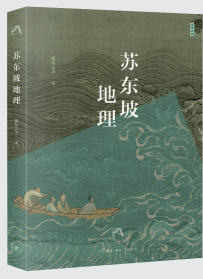
作者通过近30年的从医经历,用充满人文色彩的语言,写出了对老年人从生理、病理到心理的医学观察,并给出了她对于美国医疗体系现状的思考。

《银发世代:重新定义老年、反思医疗体系、重构老年生活》
[美]路易斯·阿伦森 著
蒋一琦 张光磊 周哲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7月出版



一场穿越世界上23座大门的人文之旅——关于史前圣所、埃及、希腊和罗马神庙、中世纪教堂、要塞、宫殿和别墅的入口,关于它们的特殊之处以及我们人类如何赋予它们意义和象征意义。

《通往历史的门:跨越西方建筑与艺术》
[西]奥斯卡·马丁内斯 著
张贝贝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7月出版



本书通过寻访地理和观赏笔墨真迹的方式,走近苏轼的精神世界。书中择要追踪了苏轼一生所行、所居之处。正是由于其宦游经历的丰富、曲折,才形成他历经沉浮后对人生的宝贵思考。

《苏东坡地理》
张星云 等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9月出版



本书聚焦主人公作家徐自白的生活。他在《庄子》等书中寻求精神慰藉,力求在纷乱的世界中达到无所动心的境界。本书融入了作者对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心理探索的思考。

《无所动心》
王宏图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22年8月出版

书人茶话

上海与咖啡:过去、今天和未来交织的韵律

唐之韵

据报道,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的咖啡店达到7857家,超过伦敦、纽约、巴黎,跃居全球之首。据说,目前上海居民人均每年喝咖啡20杯以上,年消费量比北京、广州、深圳的总和还多。可以说,咖啡早已融入了海派文化的基因。

破圈层:咖啡“征服”市民

咖啡当然是舶来品。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编纂《英华字典》时首度用“咖啡”翻译“coffee”。考虑到马礼逊曾于广州学习汉语,有学者推测,他是根据粤语音译的。1833年,另一位传教士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也出现了“咖啡”一词。无独有偶,这份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同样出版于广州。

不过,没有迹象表明咖啡通过广州传入中国腹地,也没有记录显示当时有中国人喝咖啡。想来,咖啡应该是洋商随身携带满足自身刚需的。由于清政府将洋商局限在广州进行贸易,且严格限制其活动,规定他们只能同官商打交道,因此,洋商对咖啡的钟情不大可能突破圈层对普通中国人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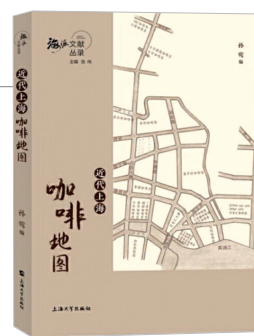
咖啡真正进入中国还是通过上海这个桥头堡,时为19世纪中叶。当时的上海滩洋杂处,有利于外来事物弥散到社会各个阶层。咖啡也不例外。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祖恩在新著《上海咖啡:历史与风景》中考证,上海最早的咖啡馆由西人开设,顾客多为西方侨民。此后,华人开的番菜馆(西餐厅)将咖啡作为餐后饮品,据说食客只要喝上几口,油腻的烟筒子、煎牛排就都消化了,堪称消食佳品。不过那时候咖啡不叫咖啡,而叫“咖啡”,除此之外,还有“高糖”“加肥”“加非”等叫法,可谓众说纷纭。

名称的淘洗过程也是咖啡从市民偶一尝鲜的“海外奇珍”,逐渐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街头的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尖,今四川北路、淮海中路、西藏中路都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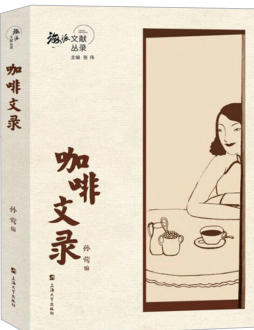


《上海咖啡:历史与风景》

《近代上海咖啡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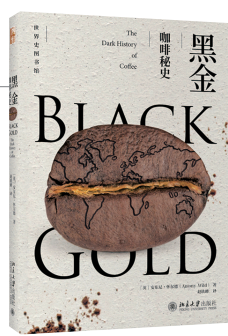


《近代上海咖啡地图》



《咖啡文录》

《黑金:咖啡秘史》



《黑金:咖啡秘史》

现出咖啡馆林立的景象。而咖啡馆主要的目标客户就是新兴市民阶层,包括商人、公司白领、作家、记者、戏剧家、律师等。

事实上,“去咖啡馆”之所以蔚然成风,和市民阶层强烈的内在需求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的聚会场所,无论茶馆抑或酒馆,如同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总是充斥着喧哗与骚动。市民阶层希望拥有相对私密的空间,或独酌,或聊天,咖啡馆恰好满足了这种愿望。幽暗的室内光线、自成一方天地的火车座、舒缓的钢琴伴奏,当然还有袅袅升起的咖啡香,共同营造出一个与市民趣味相匹配,并能供其进行社交活动的场域。由此可知,咖啡文化在上海的生成与市民阶层的发展基本同步。而在近代中国,上海是市民阶层孕育最早、发育最好的城市。

据《上海咖啡:历史与风景》介绍,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些咖啡馆日益“摊头化”:不仅卖咖啡和西点,还搭售扬州小吃、排骨年糕、鱼肉粥等摊头小吃。在我看来,这一方面是咖啡馆扩大客源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也说明咖啡已渗透市民的日常生活,喝咖啡不再那么讲究。抗战胜利后,咖啡摊犹如今日奶茶店,遍布街巷。这些摊头虽然设备简陋,但胜在现煮现卖、

方便快捷。人力车夫跑累了停下来买一杯,几口饮尽,喊声“爽气”。此情此景,与意大利人以极短时间喝完一小杯意式浓缩继续赶路,相映成趣。

连人力车夫都用咖啡解渴,“爱喝咖啡”成为上海人的标签,其来有自,可以说“咖啡征服上海市民”。

双重奏:情调与理性

这种“征服”不仅是生理层面的(如解渴、解乏),某种程度上也是精神层面的。毋庸讳言,咖啡初入中国是和西装、电灯、汽车一起被视作都市文明象征的。一个人不懂咖啡,自然会受到来自“都市”的嘲笑。《申报》登过一则段子,说某乡村教师把芥末粉当成咖啡粉,请同事品尝,传为笑谈。名人亦不能幸免。老上海有谚:马崇仁喝咖啡,塞了牙啦。马崇仁乃京剧大师马连良之子,自己也是名角,只因在咖啡馆讨牙签,遭人调侃。

那么标准“都市人”怎么喝咖啡呢?陈祖恩教授几次提到的海派作家张若谷,即堪称样板。恰巧,孙莺所编《近代上海咖啡地图》和《咖啡文录》也收录了张若谷若干文章,让我得以拼凑出这位“咖啡馆铁粉”的大致样貌。张若谷,上海南汇人,曾在比利时

鲁汶大学留学,回沪后任小报记者、主编,擅长散文随笔,小有名气。他给我的印象是:穿西装、戴礼帽,上衣左口袋永远装着一块白色方手帕,手里还拄着根司的克(拐杖),几乎整天泡咖啡馆,观察记录,大量文字涉及咖啡馆的风物。其人与其文皆稍显做作。例如,他骄傲于自己懂法语,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咖啡馆,坚持用法语和只会说英语的俄国女招待交流,虽因此点错了咖啡,仍洋洋得意。

我一度不能理解张若谷的“凡尔赛”之举,后来琢磨,这其实是示范。张若谷向读者演示的不仅是怎样品咖啡、泡咖啡馆,更是如何从中获得乐趣。这是新兴市民阶层所需要的,今日流行的所谓小资情调,或许也发端于此。

但咖啡绝不是小资的专利,咖啡馆里也不全是张若谷。当年的上海咖啡馆不乏知识分子的身影,尤其是位于今四川北路、多伦路转角的公啡咖啡馆,由日本人经营,较为隐蔽,于是成了左翼人士的集散地,鲁迅、田汉、夏衍、郁达夫都是常客。“左联”开会也常设在此地。与之遥相呼应,原本开在霞飞路上的明星咖啡馆日后迁往台北,吸引了陈映真、白先勇、尉天骢等作家,他们相聚谈文学、谈理想。

在《黑金:咖啡秘史》一书中,怀尔德告诉我们,自1555年咖啡传入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便迅速传播;十年间开出600家咖啡馆。人们在这里分享信息,议论时事,辩论经典。无独有偶,18、19世纪的巴黎咖啡馆孕育了启蒙运动,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更是将咖啡馆、剧院、媒体,看作交流、平等对话的场域。当然,欧洲咖啡馆从不缺少张若谷之类人物,咖啡馆里向上演着小资情调和公共理性的双重奏。

第三波:历史总是押韵的

说来有趣,哈贝马斯论述的18、19世纪欧洲咖啡馆和张若谷描绘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咖啡馆,虽然相隔一两百年,从咖啡产业史的角度看却处于同一阶段——都以种植园生产为经济基础,以手冲为主要饮用方式。

据怀尔德所述,18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将咖啡树引入加勒比地区,凭借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劳动人口,咖啡和蔗糖、烟草一样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巴西,那里有大面积的种植园、数以百万计的奴隶(逐渐转变成雇佣劳动力),咖啡产量急速攀升。20世纪初,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90%来自咖啡业,顶峰时,巴西咖啡占据全球市场90%的份额。不难想见,当时巴黎、纽约、上海等地的咖啡馆,用的可能都是巴西咖啡豆。

那应该是未经烘焙的青咖啡豆,因为它能长时间存储,便于长途运输。相反,经过烘焙的咖啡豆只能保存数天,研磨则会让咖啡的细胞结构暴露于空气中,容易氧化,24小时后变味。所以当时的人如果想在家里喝咖啡,得先购买新鲜烘焙好的咖啡豆,然后研磨,冲泡,程序相当繁琐。像福楼拜、巴尔扎克这样一天能灌50杯咖啡的“狂魔”,家中绝对器具齐全且有专人伺候。普通人还是去街边店买现成的方便,意式浓缩和美式就是这么流行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开始改变。二战中,为了让前线官兵喝到咖啡,美军采用新工艺,生产易于运输和冲泡的速溶咖啡,受到广泛欢迎。据统计,二战期间美军每人每年消费速溶咖啡1.4吨,按美军总兵力计,速溶咖啡年生产量超过1500万吨。战争结束后,大量美国速溶咖啡以低廉的价格涌向世界各大城市,人力车夫在上海街头豪饮咖啡的场景就出现于这一时期。

廉价且便捷,速溶咖啡短时间内便成为消费者宠儿。20世纪50年代末,速溶咖啡占据美国咖啡市场的三分之一,在欧洲也是高歌猛进,由此掀起了咖啡浪潮第一波。同时,速溶咖啡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效应有利于形成品牌,速溶咖啡巨头雀巢,就是在战后迎来高速发展的。标准化还让连锁成为可能,最典型的就是以星巴克为代表的咖啡连锁品牌。在全球化的推动下,雀巢和星巴克遍布世界,这被称为咖啡浪潮第二波,特点是品牌化和连锁化。

改革开放后咖啡文化重归上海滩,恰逢第二波浪潮汹涌,因此,像我这样的80后,对咖啡的认知是先被雀巢、后被星巴克塑造的。但不同的声音始终存在。怀尔德就是位“咖啡原教旨主义者”,他坚持认为速溶咖啡是“类咖啡饮品”,对其多用罗布斯塔豆而非品质更好的阿拉比卡豆,以及粗糙的加工工艺充满不屑,有类似想法的远不止怀尔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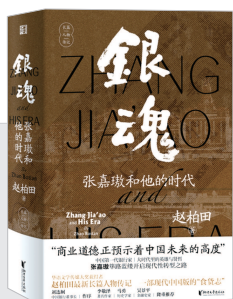
2002年以来渐成趋势的咖啡浪潮第三波,表明这种诉求十分强烈。精品咖啡注重咖啡豆的品质和风味,崇尚“新鲜烘焙、新鲜研磨、新鲜冲泡”,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向传统回归。不同的是,精品咖啡不依赖大规模种植,而是直接与农户合作,以避免价格倒挂,实现公平贸易。这再一次印证了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历史绝不重复,但总是押韵。

合上书本,漫步在今天的上海街头,看着方兴未艾的精品咖啡,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由过去、今天与未来交织而成的韵律?

三味书屋

他的奋斗是近代中国银行家群体的缩影

李金哲



《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
赵柏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当代学者、非虚构作家赵柏田出版了长篇传记《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作者一方面运用公开出版的文献,如两卷本《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一方面埋首故纸堆,爬梳出张嘉璈手书日记等珍贵史料,在“纯然以事实为旨归,无一词一语无来历”的基础上,以朴实细致的笔触勾勒了传主一生的行藏。

在我看来,本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长久以来,大众对民国人物的兴趣聚焦在军事和文化领域,对于以张嘉璈为代表的银行家群体则缺乏关注。但实际上,他们的奋斗同样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落寞,也足以给后人以镜鉴。

1889年11月12日,张嘉璈生于上海嘉定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有兄弟八人、姊妹四人。张嘉璈后来成为银行家、实业家,为奠定中国现代银行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二哥张君勱乃思想家和政治家,二妹张幼仪则嫁给大诗人徐志摩(1921年离婚),后创办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云裳服装公司,是一位独立女性。其他兄弟姐妹也皆有所成,堪称满门俊彦。

但这并不是一个富家子一路高开高走的故事。实际上,因父亲投资失败,张

家道中落,张嘉璈只得放弃科举,转而报考一般人不愿去的上海方言馆,接受新式教育。1906年张嘉璈考上官费生,赴日本应庆大学攻读经济学。经济拮据的他每餐只食一片鱼肉,猪肉更是每月一小片,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但张嘉璈不以为意,在著名经济学家、银行学权威堀江归一的指导下,系统学习银行学、金融学、财政学,并立下“金融救国”的志向。

归国后,张嘉璈进入清政府新设立的邮传部,因办事认真颇受上司赏识。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迫民国建立,原本作为清王朝中央银行的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张嘉璈“专业对口”,被任命为上海分行副经理。

在上海,张嘉璈结识了李铭、陈光甫、徐新六等年轻金融家,编织了最初的人脉网。他们多出身江浙两省,故被外界称为“江浙财团”乃至“江浙财阀”。张嘉璈这辈子对“财阀”一说尤为厌恶,辩称以中国银行业的政治及社会影响力,哪里配得上“财阀”呢?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金融史,倒更像所谓财阀与各路政治势力斗法的历史。“财阀”偶有胜绩,最终仍是惨败。

第一次斗法发生在1916年5月。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拮据,为纾解困境,竟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兑钞票,止付存款。“停兑令”一出人心惶惶,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掀起挤兑潮,市面动荡,百业萧条。命令传至中行上海分行,张嘉璈和上司宋汉章一致认为如若奉命,不仅中行信誉扫地,更会给新生的中国金融带来灭顶之灾。于是在张嘉璈的支持下,中行上海分行连续三天照常兑付钞票、付现应付款,并在《申报》上公开拒绝停兑令,以此赢得上海市民信任,平息了挤兑风暴。

这次斗法,28岁的张嘉璈态度坚定、勇于任事,在金融界树立起威望。1917年8月调往北京,升任中国银行总行副经理,后又升任总经理。

其时军阀混战愈演愈烈,他们把银行当敛财工具,强迫其为各项开销垫款。长此以往,中国银行有沦为“军阀提款机”的危险。张嘉璈痛定思痛,大力引入商股。他认为只要改变所有权结构,使商股超过官股,中行就能摆脱军阀操纵及政权更迭的影响。至1923年,商股已占中行全部股份的99.75%。无独有偶,交通银行、盐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也相继完成商股化。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更是将目光对准普通市民,专注于吸收小额存款,避免同军阀打交道。

这种举措取得了一定效果。在那个纸币贬值的年代,中国银行发行的京钞总体坚挺,就同其与军阀保持距离,相对独立有关。张嘉璈也利用这段时期,按照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规则对中国银行进行改造,如成立监事会,推动采取西式会计,完善银行规章等。为提升中行职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他还主持创办了《中行月刊》和《中行生活》这两份内刊。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此前,蒋介石已多次向以张嘉璈、陈光甫等为代表的“江浙财阀”伸手要钱,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把银行当小金库随意支取。张嘉璈高低抵挡,渐感不支,经常在日记中吐槽当局不懂金融常识,强银行所难。

事后看,蒋介石未必全然不懂,而更可能是用这种手段将“江浙财阀”绑到自己的战车上,形成利益共同体。1927年8月和1931年12月,蒋介石有两次短暂下野而很快复出的经历,个中缘由错综

复杂,但和继任者得不到“财阀”支持,黯然倒台不无关系。“财阀”固然不喜欢蒋,可南京国民政府在蒋的指使下逼“财阀”购买巨额公债,蒋一旦失势,当局赖债怎么办?

饮鸩止渴的下场只能是毒发身亡。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试图取代中、交两行的地位。1935年,当局干脆以尚未流通的国债形式强制参股,攫取中、交两行50%的股份,随即改组管理层,张嘉璈被排挤出局。作者用惋惜的笔触写道:“他努力20余年,建立不依附于政府的独立商业银行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

此后张嘉璈被“收编”,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学者从政”潮中出任高官,历任中央银行副总裁、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等职。1937年7月至1942年12月,张嘉璈主持的铁道部和交通部用铁路运送部队2270万人次、军需品435万吨,修筑公路约4950公里,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战后张嘉璈本有振兴国家的规划,无奈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毁灭了他的梦想。他一度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试图收拾残局,所幸及时认清现实,辞职远走美国。晚年,张嘉璈撰写《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以亲历者视角,从货币经济和财政收支的角度剖析了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原因。1979年张嘉璈病逝于美国,享年91岁。

纵观90余年的漫长人生,张嘉璈怀揣“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的理想踏足银行业,勉力促使金融和财政制度的现代化转型。为此他曾与当权者博弈,但受限于环境与时代,终究无力回天。不过,他对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改造与完善,毕竟给后来者打下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张嘉璈的努力未曾白费。

第三只眼

古城消失千年的启示

李文畅

如果不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巴尔米拉这个名字,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所广泛知晓。2015年5月,极端组织武装力量攻占了这座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仅200公里的古城。极端分子占领这里,除了叙利亚政府军守备薄弱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瞄上了巴尔米拉的文物古迹。

西亚北非地区曾经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目前已知最早的人类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就诞生于这片黄沙席卷的土地上。作为一个建城史可能比罗马城都要久远的西亚城市,巴尔米拉承载了政府的独立商业银行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

此后张嘉璈被“收编”,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学者从政”潮中出任高官,历任中央银行副总裁、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等职。1937年7月至1942年12月,张嘉璈主持的铁道部和交通部用铁路运送部队2270万人次、军需品435万吨,修筑公路约4950公里,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战后张嘉璈本有振兴国家的规划,无奈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毁灭了他的梦想。他一度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试图收拾残局,所幸及时认清现实,辞职远走美国。晚年,张嘉璈撰写《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以亲历者视角,从货币经济和财政收支的角度剖析了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原因。1979年张嘉璈病逝于美国,享年91岁。

纵观90余年的漫长人生,张嘉璈怀揣“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的理想踏足银行业,勉力促使金融和财政制度的现代化转型。为此他曾与当权者博弈,但受限于环境与时代,终究无力回天。不过,他对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改造与完善,毕竟给后来者打下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张嘉璈的努力未曾白费。

崛起得益于两河文明的滋养,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让它有别于那些靠积累农业剩余价值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都市,而是靠商业迈入崛起的快车道。巴尔米拉地处地中海东岸的沙漠绿洲之中,本身就具有人类聚居的基本优势,其次,它也是欧洲人与两河流域乃至整个古代高原开展贸易文化往来的必经之地。巴尔米拉是一个商业枢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最早的“海上马车夫”,曾经在文字上深刻影响欧洲文明的腓尼基人就在这座城市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古希腊文明兴起后,巴尔米拉也在经济往来中汲取了来自巴尔干的养分。

罗马帝国的兴起,让巴尔米拉这一商业城市再也不能保持“光荣孤立”,而是必须在罗马人和他们的死对头波斯人之间作出抉择。经过抉择,巴尔米拉这座城暂时倒向了罗马的阵营。在互动交流中,巴尔米拉也“越来越像罗马”,巴尔米拉的居民也把自己视为罗马的一分子。

但是,如作者所言——“巴尔米拉的历史应该是蜷缩在大文明旁边的一个小社会的历史,小社会的精英或多或少地浸淫在大文明的文化当中,导致产生混合的文化”。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罗马化”的过程中,巴尔米拉并没有因此迷失自我,它继续保持着与过往贸易伙伴的密切联系,包括罗马的宿敌波斯人在内,也保留着受到希腊人影响的艺术文化。

极端组织会绞尽脑汁地去破坏它,或许也与恐惧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有关。可是他们恰恰忽略了,他们也许能暂时毁灭承载着独特精神文化的建筑,但只要人类继续用平等包容的眼光来审视外面的世界,极端分子的目的就永远也不会达到。巴尔米拉的古迹虽亡于战火,但多元文化主义将不朽永存。